9月1日，是全国中小学开学的日子，也是教材教辅发行旺季。由于教材教辅发行中存在高额利润，不少书商盯上了手握权力的官员，不惜用巨资行贿，教育部有官员也被拉下水。(见8月28日《检察日报》)

教辅成“教腐” 家长何其苦

教辅成“教腐”，众人吃学生，再次印证权力、利益、腐败三者的必然关系。如今学生教材与教辅少则数册、十数册，多则数十册，全国数亿中小学生，这个市场有多大不难想象。按书商说法，“公关费一般占到码洋的5%到10%”，有多少钱成了官员的囊中物，造就了多少腐败分子？

为了孩子，钱是肯定要掏的，家长的钱成为别人的腐败载体也就罢了，而当学校、教师也加入到教辅这条利益“食物链”之后，家长们的噩梦才刚刚开始。一些地方，为了“避嫌”，学校不统一购买教辅书，而是由科任教师列出书目，让家长自行购买，于是家长的麻烦就来了。每逢开学，家长们就要放下手头的工作，抓着书目四处出击，帮孩子找教辅书，在书店排长龙。

买到书还好，要是没找到，你就焦虑了。要么你的孩子没有教辅书，没法做作业，每天就等着科任教师打电话向你投诉；要么就发动亲戚朋友，逛书店、上网店，全城大搜索，像沙里淘金一样淘一本书。实在到了无路可行，只能向买到教辅书的同学借书回来复印、装订成册，聊供孩子使用。找书那份焦急与无奈，失落与气愤，种种辛酸真“不足为外人道”。说到一年一度找教辅书，哪位家长不是一肚子火？

某一年，笔者比较迟才到书店帮儿子找书，不幸其中一本教辅书找不到，于是开着车找遍所有的书店，国营的、民营的，甚至打电话到周边地区书店，皆一无所获。无奈之下，只得打人海战术，发动亲朋帮忙找书，一位在高中任教的朋友发动他那些在小学任教的学生，其中一位小学校长发动全校师生找书，结果才在一位转学过来的学生手中，找到那本珍贵的教辅书！那一刻真是百感交集，五味杂陈。

相信许多家长都有同感，小时候我们念书时，作业就在课本里，不用再另找教辅书做作业，现如今的教材都不重视这一环节，作业多半交给了教辅书，于是不但养肥了教辅书产业，助长了教辅市场乱象，也严重增加了学生的学业负担，让学生减负遥遥无期。教辅书满天飞，家长、学生深受其害，应该反思的不仅是教师、学校、教育官员，包括方针、方法在内的教育政策都存在一定的偏差，应试教育就是屡教不改的祸害之一。

在教育体制一时难以扭转之前，学校能否急家长之所急，想家长之所想，不再折腾家长，统一采购教辅书发给学生呢？ **连海平**

日前，延安重大交通事故后，亡灵未远，身份未证，家人心碎……就在烈火中鲜血浸染的生死场上，面对36条生命的顿逝，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竟然腆着肚子笑，新华社记者拍下了这一印象，网友随后“人肉搜索”出杨达才戴不同名表的图片数张。

车祸场中的笑 有点冷血

杨达才的笑，或许只是跟人打招呼时的习惯性表情。但是，正如有网友所言：“在这样惨烈的现场发笑，要么神经病，要么无人性。”这话不完全是一种情绪的宣泄。我们没必要对一个普通公民在车祸场中的笑上纲上线，但杨达才作为安全监督的官员，笑得的确太不合身份不合时宜。出了事，这是你未尽责，无论讲职务还是讲良心，都要负责任，笑得出吗?从干群关系来说，情为民所系，休戚与共，你有心笑吗?他的笑不是一个偶然的表情，而是一种心态的反映，触及到了公众的情感底线，激怒了公众。

碰到天灾人祸，我们绝大多数的干部，总能勇担责任，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挥抢险，在情感上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同样是在陕西，2011年一家肉夹馍店液化气爆炸致9人死亡37人受伤，省长赵正永立即向当事人及家属道歉：“对不起大家”，情真意切。同样是在祖国西北部，今年5月间，甘肃岷县“5·10雹洪灾害”中，岷县2000多名县乡干部在第一时间深入村社，投入抢险救灾工作。老百姓在灾中灾后称，“有党和政府的关心，我们啥都不怕”，其情其景，不是一句简单的应景话或宣传语。

但是，的确也有如杨达才一般的干部，笑得让人心寒。前年伊春空难，有官员在现场微笑着合影留念；去年西安煤气爆炸，有官员笑得更“灿烂”。当官员在感情上不是把自己和人民连在一起，那么，他的一举一动，就不可能赢得人民的感情。灾难深重，同胞丧生，官员若还能轻松调侃，那也是公众在感情上不能接受的。殷鉴不远，去年“7·23”甬温线动车事故后，时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的王勇平话语间玩“幽默”，表情过于轻松，结果遭到公众的普遍质疑。

公众不是不容许官员笑，不是不容许官员幽默智慧，而是希望看到官员对公众有真感情。因为，一个轻视人民、轻视民心的官员，怎么可能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呢?现实中的确有个别干部，他们可能不会像杨达才这样傻笑，但他们若对老百姓缺乏感情，不能为群众急苦赴难，即便他们在镜头前做事说话多么有板有眼，也只是“履行公事”政治“作秀”。这样的官员，也难与老百姓贴心。

至于公众对杨达才多场合屡换名表的质疑，事实如何还不清楚，再说，即便是官员，如果用自己正当的收入买几块表戴，也有这个权利。弄清他身后有无“名表门”，这是纪委的事，公众不妨拭目以待。但杨达才在车祸场中腆着肚子笑，这实在不该是一名领导干部应有的冷血。 **秦丹**

加大财政扶持力度 不如减税更有效力

最近，不少地方政府纷纷提出加大对企业的财政扶持力度。比如珠海市决定拿出8.9亿元作为支持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青岛市某区出台十条经济发展扶持政策，决定每年安排10%的可支配财力，对全区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给予扶持。此外，深圳、厦门、云南等地也有类似动作，不知道这算不算“地方投资7万亿元”中的一部分。

无利不起早，政府给企业撒钱，不是不求回报的。财政扶持政策主要是财政部门根据政府产业发展规划，运用财政政策资金支持企业发展、扶持企业做大做强，以培植财源，促使经济长期健康地发展。因此，政府阔绰大方地给企业撒钱，实际上是“支持企业是手段，培植财源是目的”，最终希望出小钱收大钱。

不过，在经济增速放缓、出口下滑、房地产行业受调控、各地土地财政吃紧、建设项目受影响、税收受到较大冲击、财政收入下降的背景下，各地财政扶持政策恐怕更主要的是为了“稳增长”，假产业规划引导而行。“稳增长”不只是国家层面的要求，也是各地政府的现实问题。增长不“稳”，税收下滑。今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为54932亿元，同比增长9.8%，增速同比大幅回落19.8个百分点，这是多年来所罕见的，对各级政府的压力可想而知。

从一般意义上讲，税源的规模也就是GDP的规模，税收收入应与GDP保持基本同步，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但是，我国的财政支出压力比较大，尤其是行政支出庞大，需要以较高的税收幅度来维持正常或不正常的、包括三公消费在内的行政性开支。一旦税收大幅回落，开支压力就会骤增。前些时候，某地一个官员说，由于该区利税大户某企业行情不振，利润下滑，该区税收立马捉襟见肘。

大方撒钱能给企业打强心针，但优势比较，不如大方减税。首先，政府撒钱虽然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仍不脱把政府当经营主体、以行政干预市场之嫌。减税则是尊重市场的做法，会大大激发经济活力，刺激企业增产开工，扩大就业，培植丰厚税源，走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恶性循环。其次，直接撒钱是定点投放，只会让少数(重点)企业受惠，众多处境艰难的中小企业无此福气。如果把有限的扶持资金像撒胡椒面一样都撒一点，又形不成扶持重点，起不到引导作用。而减税是普惠的，能从更大的面上去培育经济元气。同时，结构性减税对整个经济发展具有无形的引导作用。再者，政府拿钱去支持部分企业，这个钱要么靠多收税费来补充，要么要靠债务融资来维系，前者使困境中的企业雪上加霜，后者助推货币超发，最终都要转嫁到所有市场主体身上，貌似大方地撒钱行为有损不足而奉有余之嫌。合理的减税不存在收东家补西家，也不存在为获财政扶持而竞争，有利于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

更重要的是，可以借减税之机限制政府收入增幅，压缩三公经费，为建立透明的现代政府奠定合理的税收基础。危机也是转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廖保平**

公务员限价房指标叫卖30万

据工人日报报道，为解决省、市直属机关公务员住房问题，海南省、海口市2009年开始修建近万套公务员限价商品房，并以市场价三分之一的价格销售给公务员。有人在拿到房子指标后公开在网上发布信息或让中介公司代理出让，转让费最高达30万元。

对此，海口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局市场秩序处处长戴开权表示：“省政府已出台相关规定，如果公务员把政策性住房指标拿到市场去卖，一经查实立即免职，并收回指标，决不允许一些人用来买卖从中获取暴利。”

漫画/**赵乃育**

诙谐标语，何必沉重解读？

“不学习的女人只有两个下场：逛不完的菜市场，穿不完的地摊货。不学习的男人只有两个下场：穿不完的阿迪吊丝，捡不完的破瓶烂罐。”这条由某高中高三学生上传的“班级励志标语”，引起了网友的热议，有人认为“新颖、有趣”，有人则担忧其背后透露出来的不正常的价值观会“带坏孩子们”。(8月28日《大河报》)

一条标语，引发不同的解读。该校老师表示，学校不禁止学生言论，但此标语是学生所写，非校方意思。可无聊之人叹道“年轻人果真越发功利”。而稍有情趣者则会心一笑，知道所谓励志标语，不过是“青春才情的幽默发泄”。我们生活的现实环境，总被标语文化充斥：一方面，习惯将意念实物化(例如写条幅明志)；另一方面，习惯依据只言片语反推人心。受制于大背景的沉重，国人剖解标语，往往思虑太多，失去了那份“淡看”的本能。

标语，不一定“书以言志”。包含“标语”在内，广义的文学创作，天然有夸张、包装、“矫情”一面——哪有人直白、无趣到临摹式地“我笔写我心”呢？新闻中诙谐标语的创作者，面对生活的苦闷迷惘，摆出一副市侩的模样，多半是想借由“自我矮化”来短暂解压。

一直以来，民众将标语的功能局限化了，只知其能激励人心、昂扬斗志，却不知其也有博人一笑、纾解身心之效果。将标语高尚化、道德化，无益于它发挥最大效用。试问，若仍还单纯鼓吹“人生难得几回搏，此时不搏待何时”等口号，岂不是给“苦海”挣扎的学子们，又增添了几许悲情愁绪？关于标语，某些误区也该矫正了：其一，标语未必有立竿见影的作用；其二，标语未必就得遵守语体规范。

将一本正经视作常态，用严肃的眼光看问题，会让一切变得太沉重。一句诙谐标语，诸多围观者却祭出“价值错位、利己主义”的古板腔调，实在令人遗憾。一个物质化的时代，高中生就算身受感染也正常，说几句看似三俗的话，需要上纲上线吗？即便校园内的求学者，也难以彻底脱离社会存在。这就注定了，他们的言行，本就难以展现领先的价值观，而不过是外界环境的投射。“不学习的女人只有两个下场：逛不完的菜市场，穿不完的地摊货”——如果说这话有问题，现实生活环境的浸染，难以撇清干系。

有怎样的社会浸染，便有怎样的学生身心。所以，倘若要认真分析一句标语的指向，只会得出些无趣结论。何必认真呢？“标语”本就不是写实的艺术，诙谐的言辞可能只是想博大伙一笑，只是热闹一场，笑过则忘了吧！ **然玉**

“NBA”进汉语词典并无不可

28日，百名学者联名举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涉嫌违法，原因是该字典中首次收录了诸如“NBA”等239个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按照举报人的观点，以字典的形式将西文引入汉字系统，是一种对汉字“最严重的破坏”。(8月28日《北京晚报》)

对这一事件的评价，需要首先从文化方面进行分析。

自仓颉造字以来，汉字虽然以方正形式加以固定，但是汉字体系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众所周知，我国古代汉字行文中并没有标点符号，在晚清以来的西学东渐过程中，才开始从西方全面移植。直至北洋军政期间，我国第一套标点符号规范才以“训令”的形式通行于世。如果按照现在某些学者的观点，对汉字体系破坏“最为严重”的不应该是收录的二百多个西文单词，而应该是这些从西方引进的符号。

中华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兼容并包的文化，从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到魏晋的骈文，从明清的八股文，到新文化运动的白话文，中华文化的发展史堪称一部文化融合史，这也正是兼容并包和与时俱进精神的具体体现。

语言文字作为一种文明表达方式，承载特定文化内涵并不是其首要价值，更重要的是在于交流。要为民所用，要好用，要实用。在现代社会中，中西文化交流已为常态，从语言上“人为设卡”对人对己都无利益，恐有阻碍交流之嫌。正因为如此，像“NBA”这种本身起源于美国，在民间已经耳熟能详的外来词汇，非要另行其道改称为“美职篮”，不仅难为百姓接受，而且也丝毫体现不出来任何文化上的意义。

该部字典引进的二百多个西文单词，都是那些早已在市井之中，或者我国出版物中耳熟能详的词汇，引入词典无非是顺应民心，方便交流。如果非要说这样做“有辱斯文”的话，那么，责任也不在字典编撰本身。字典的主要功能并非在于“守卫文化”，而在于实用和适用。

批评者说“西文入典”违法，这个更加值得商榷。法律规定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并没有明文否认西文不可以写进字典。此外，字典作为工具书，使用者不仅为国人，可能还会是初学汉语的外国人，汉语已经越来越成为世界交流的重要工具，人为地制造文字障碍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朱巍**

复旦大学女博士于娟的抗癌日记，记录了一个“神医害命”的悲剧故事：2010年被确诊为乳腺癌晚期的于娟，在听说安徽黄山有位专治癌症的“杨神医”之后，与两位病友毅然放弃正规治疗，专程前往黄山接受“饥饿疗法”——他们每天不吃饭，只吃少量葡萄和芋头，以及“杨神医”熬制的中药。最终，于娟和病友不仅付出了巨额药费，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终结“神医害命”悲剧 需多管齐下

于娟和病友沦为“神医害命”故事的悲剧主角，明显是出于求生本能而陷入了“病急乱投医”的误区，这种吃亏与学历高低没有太大关系。面对“神医”漏洞百出的宣传，正常人或许能够觉察出“饥饿疗法”的不靠谱，识破“咳血是将癌细胞吐出来”的谬论，进而意识到“3个疗程保证治愈癌症”纯属忽悠，但那些身患绝症的受害者，眼中所见心中所想的恐怕全是通过“神医”抓住渺茫生机，上当受骗几乎是必然的结果。

理解归理解，反思归反思。为何总有那么多人被各种“神医”骗局忽悠，轻则被谋财，重则被害命？为何各种巫医神婆乱象，在信息如此通达的现代社会仍层出不穷？追根溯源，主要原因有三个：其一，相关部门的监管打击力度不够；其二，社会公众缺乏医疗知识普及；其三，病友协会等公益性社会组织空缺。

治理“神医”之乱，首先要堵住监管乏力的漏洞。让于娟等人断送性命的“杨神医”，原本只是常州一所中学的会计，仅仅看过《中医秘方大全》中的一些治病偏方，便将自己包装成了能够治愈癌症的“神医”。很多受害者都曾被“杨神医”的“香港特区行医”证书、“国际肿瘤防治专家”证书、“2010中国影响力人物”等资质和荣誉所蒙蔽，这或多或少与有关部门的监管存在“真空”有关。近些年，“江湖游医”谋财害命的事件时有发生，卫生、工商、公安等部门不能总等到悲剧发生之后才展开行动，主动治乱更有助于减少民众的损失。

治理“神医”之乱，还要在社会上进一步普及医疗知识。曾经有“伪神医”鼓吹“吃生泥鳅可去虚火”、“喝绿豆汤能治糖尿病”、“用砒霜杀死癌细胞”，这些纯属忽悠的论调与“杨神医”推崇的“饥饿疗法治癌症”一样，都明显有悖常识。但是，当这些骗局穿上“养身”、“食疗”的外衣，再点缀几分“民间秘方”的色彩，一些缺乏基本医疗常识的人，很可能就失去了判断能力。总体而言，我国目前的医疗常识普及工作做得还很不够，市面上的各种养生书籍和电视中的养生节目也不够规范，这给打着“神医”幌子的骗子提供了行骗的土壤。

除此之外，治理“神医”之乱，还应从完善社会公益组织的角度求解。在国外，人们一旦罹患疾病或遭遇医疗问题，都可以非常方便地向各种公益性的病友互助协会、患者心理辅导机构求助，因为除了专业的医学治疗，良好的心理辅导对患者也至关重要。在这些公益性组织里，患者及家属都能相互扶持和交流经验，能够有效地防止一些人走入歧途或陷入骗局。然而，这种公益性组织在中国普遍缺失，常常让患者和家属不能及时得到帮助，只能凭经验或运气自己寻求解决之道，这给“神医”骗子们提供了可乘之机。

每一起“神医害命”的悲剧，都牵连着财产和人身健康的损失，也映照出当前社会的某些不足。只有吸取这些血与泪的教训，最大限度地健全监管制度，普及医疗常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才能让那些招摇撞骗、无证行医的“神医”们无法再谋财害命。 **汤嘉琛**

《华尔街日报》27日文章称，中国一个招聘网站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政府职位成为目前中国求职者的首选，这反映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暗中涌动着一股不安情绪。(8月28日《环球时报》)

政府职位 为何成求职首选

所谓政府职位，也就是公务员。工作稳定，内容相对轻松，技术含量不是很高，而却有着较好的待遇，以及所谓的“体制红利”——公务员身份上附着的诸多利益，都是吸引优秀人才的魅力。

然而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优秀人才都去考公务员，政府职位成首选，不是什么好事情。如果原本应当在技术和专业性要求更强、更需要创造性的企业和研究所发挥作用的理工学科人才集中在政府部门，就会造成人才资源配置的失衡。

公考热的原因，不只因为就业难，更不是权宜性选择。公务员职业连着仕途，仕途在某种程度上又具有“期权”效应，那么这个职业带给人的发展预期，自然就不是通常的口径能计算的。

俄罗斯也出现了公务员热，前总统梅德韦杰夫说：“青年想当官的现象让我很担心，当青年坚定不移地选择公务员这条道路时，有一系列问题：这是个有名望的职业吗？不是很有名望。付的薪水多吗？付的不多。这意味着，他们选择这条道路是因为这是快速致富的方法。官员职业在俄受欢迎说明腐败现象严重。”这对我们有启示。

公务员工资不是非常高，但很多人生活水平却高人一等。这树立了一种“成功的榜样”。职业与权力带来的超国民福利，我们习惯称之为“体制红利”，达到这种福利水平，体制外的人需要付出不对称的努力。

政府职位成首选，不单纯是就业取向问题，而是制度与体制问题——社会公平与利益分配决定着职业的冷热。 **马涤明**